

飞扬与落寞
Victory and Loneliness

巴金的

知与真

巴金在人们印象里，是一个没有城府的人，是一个完全不设防的人，是一个天真的人，没有城府所以易受攻击，完全不设防所以容易受伤，天真所以不应当放弃理想。『夫童心者，绝假纯真，最初一念之本心也。』巴金根本就是一个「童心」之人，靠「绝假纯真」而活着，靠「最初一念之本心」而活着……「童心」只在人类的过去，也只在人类的将来；目前的人类正行走在从过去到将来的中途，那是跟「童心」无缘的。『后现代』和『后后现代』的浪潮已把人类威胁到「童心无人可守」的境地……巴金的价值，就在用超过一个世纪的生命，告知红尘滚滚之中途上的人们，世间还有「童心或有人守之」之一境。

彭小花 编著

东方出版社
Oriental Press

飞扬与落寞

Victory and Loneliness

巴金的知与真

□彭小花\编著

東方出版社
Oriental Press

责任编辑：乔还田

特约编辑：柴 桦

装帧设计：筱 明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巴金的知与真 / 彭小花 编著.

- 北京：东方出版社，2005.11

(“飞扬与落寞”系列丛书 / 恽哲主编)

ISBN 7-5060-2361-X

I. 巴… II. 彭… III. 巴金 (1904~2005) - 生平事迹
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29489 号

巴金的知与真

BAJIN DE ZHI YU ZHEN

彭小花 编著

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通县华龙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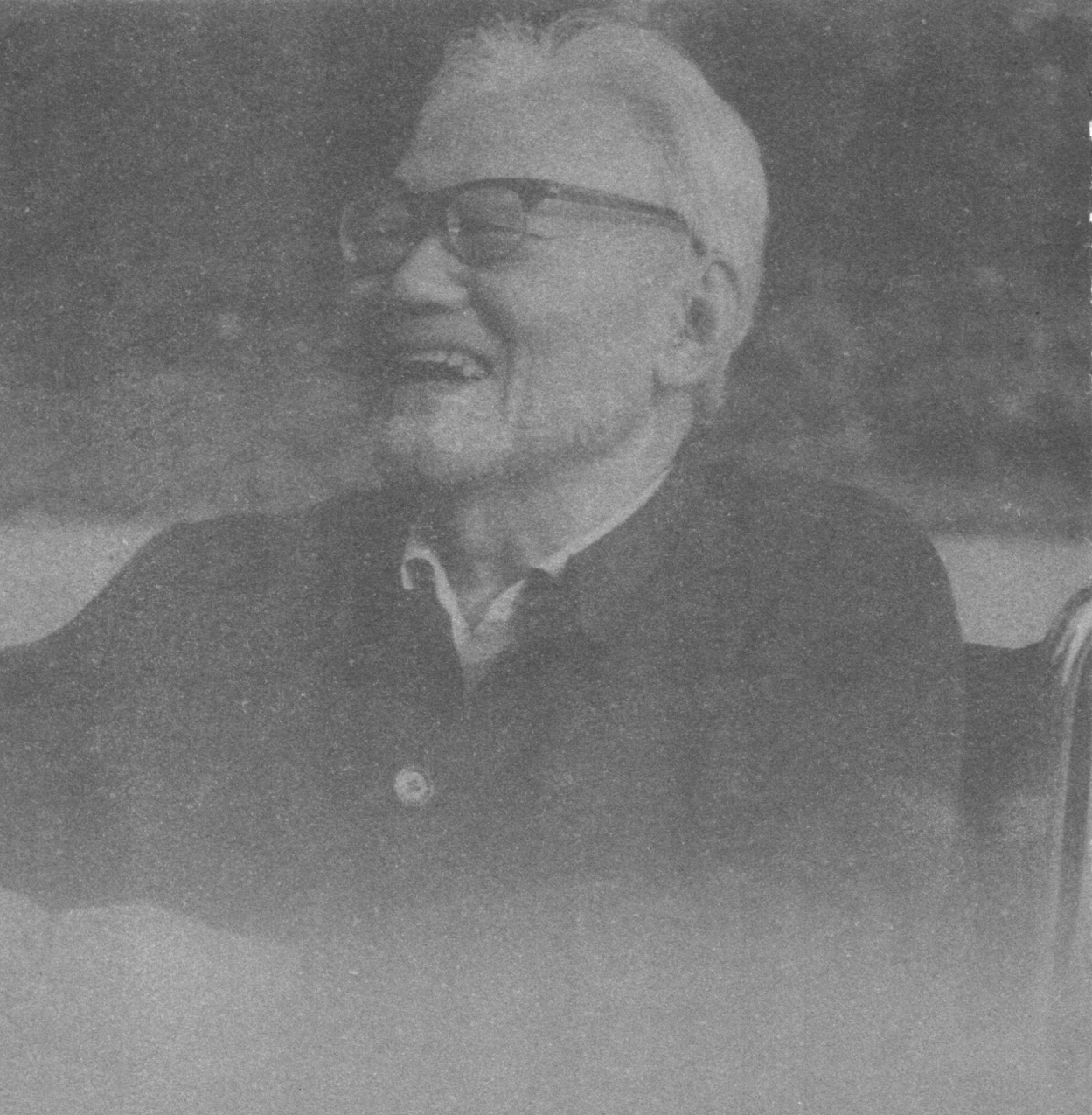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：730 毫米×970 毫米 1/16 印张：25.75

字数：321 千字 插图：258 幅 印数：10000

ISBN 7-5060-2361-X 定价：49.80 元

飞扬与落寞

Victory and Loneliness



他说：“我写作不是因为我有才华，而是我有感情，对我的祖国与同胞我有无限的爱，我用作品来表达我的感情。”

他说：“我不是文学家，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。……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小说家。我开始写小说，只是为了寻找出路。”

他说：“我从小就不大爱讲话，但有很多感情要表达，所以才写文章。”

他说：“人只有讲真话，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。”



■ 1984年10月,巴金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

香港青年们用这样的话献给巴金老人:“没有人因为多活几年而变老,人老只是由于他放弃了理想。岁月使皮肤起皱,而失去热情却让灵魂出现皱纹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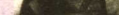
■ 思索

“‘写吧，写吧。’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。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，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世，我要写，我绝不停止我的笔，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，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，我的爱，我的恨也不会人间消失。”这是巴金发自内心的真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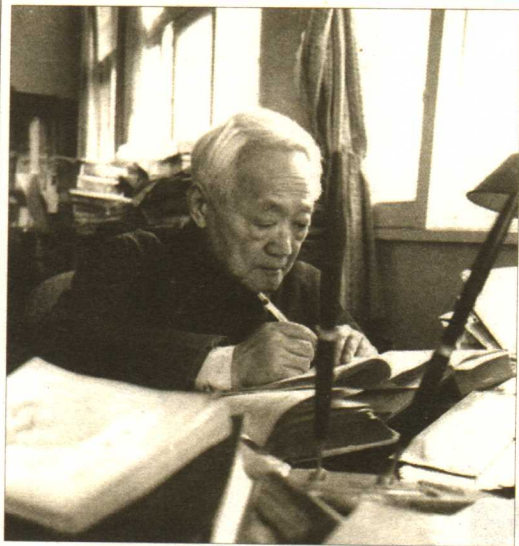
「...」

我對學生
說：『你們要
知道，你們的
生命是屬於
我的。』

“不”、“有”、“的”等字。



序论 生之忏悔



■ 终身笔耕不辍的老人

巴金一生中创作与翻译了1300万字的作品。他的创作以中、长篇小说为主。由《灭亡》、《家》到《寒夜》，这位热情勤奋的作家创作了多部作品，并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。



■ 笑对人生

在血雨腥风的抗日战争年代，巴金坚定自己的精神和信念，不屈不挠，争取民族的解放和胜利；在是非颠倒的十年动乱期间，巴金笑对人生，顽强地挺过来，活下去。

巴金有一部书，叫《生之忏悔》，我们现在可以拿这几个字，来描绘他的一生。巴金所以显得珍贵，不在于他是一个“控诉者”，而在于他是现代中国第一等的“忏悔人”。

每当社会的灾难过后，中国就会涌现无数的“控诉者”，向大家，向国家，向世界倾诉自己的委屈与哀怨。中国文化史曾被人视为一部“控诉史”，屈原的诗是控诉，《窦娥冤》是控诉，伤痕文学还是控诉。

回忆“文革”的无数文章，不管是各类干校杂记，还是劳改日记之类，都是“控诉体文字”。“好控诉”而“不忏悔”，似乎已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。巴金也曾经是“控诉体”的作家，但随着年事的增长，他不断地从“控诉”跃进到“忏悔”，把自己也送上良心的祭坛。

“控诉”与“忏悔”有什么不同呢？有很大的不同：控诉是责人，忏悔是责己；控诉只视自己为受害者，忏悔还视自己为帮凶……

一、近于苛刻的认罪

忏悔不是一般的责己，忏悔的本义是“认罪”(confession)，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，承认这社会上种种罪恶之流行，也有自己的一份责任。

巴金就是这样地去“认罪”的。他在“认罪”的态度和深刻上，甚至超过

■ 巴金青铜像

巴金文学院中的巴金青铜像由四川雕塑家谭云创作，基座后面是一堵汉白玉墙，上刻巴老手迹“讲真话——把心交给读者”。



■ 把心交给读者

几十年来，巴金在人们心中如一盏长明灯，照亮文坛，给人精神慰藉。





■ 凝望恩师鲁迅

巴金曾说：“我勉励自己讲真话，卢梭是我的第一个老师，但是几十年中间用自己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。我看得很清楚，在他，写作和生活是一致的，作家和人是一致的，人品和文品是分不开的。他写的全是讲真话的书。”



■ 晚年巴金

晚年的巴金在家人的悉心照料下，生活在轻松温馨的家庭氛围中。

了他自认的“启蒙老师”卢梭。卢梭的《忏悔录》作为卢梭的“灵魂告白”，是讲真话的，但更多的是一种“辩解”或“辨诬”；巴金的《随想录》受惠于卢梭的《忏悔录》，也是讲真话的，但却更多的是“自责”与“愧疚”。卢梭也责己，但不至于苛刻；巴金责己，已至于苛刻之程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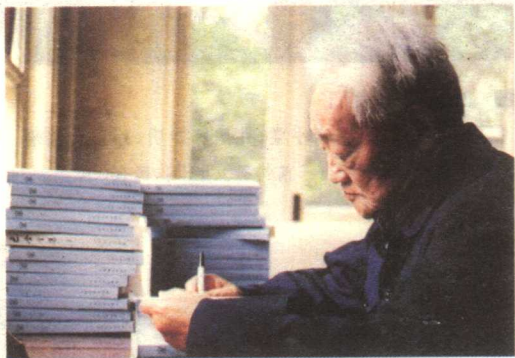
巴金在青少年时代就产生了类似19世纪俄罗斯“忏悔贵族”那种忏悔意识与赎罪心理，产生了缘于祖先罪恶的道德上的歉疚之情。他说：“我的初衷是：离开家庭，到社会中去，到人民中去，做一个为人民‘谋幸福’的革命者。”

他由钟爱无政府主义（安那其主义）而接触到托尔斯泰，读过托氏《一粒麦子有鸡蛋那样大》、《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》等作品，留学法国期间译成《脱落斯基的托尔斯泰论》载1928年10月10日的《东方杂志》第25卷第19号，第一次公开使用“巴金”发表文章。《忏悔录》（1879-1882）是托氏灵魂“激变”的自白：“我过着寄生虫的生活。”“我三十多年来所从事的不是谋生，而是在自己和别人身上扼杀生命的我。”“我的生命是谬与恶”……

巴金19岁离家闯上海，从此自食其力。解放初期自觉投身思想改造，向工农兵学习，为工农兵写作，想以积极行动偿付过去对人民的欠债。“文革”后痛定思痛，用颤抖的双手剥开已经结痂的伤口，饱蘸血泪写下这部“现代忏悔录”。“我的箭垛首先是自己；我揪出来示众的也首先是自己。”“我挖别



■ 巴金全集



■ 写作



■ “人民作家”——巴金

2003年11月25日，巴金百岁生日，国务院在上海授予巴金“人民作家”光荣称号。



■ 巴金与儿女们

后排左起：儿子李小棠、儿媳陈晓明、外孙女端端、女儿李小林、女婿祝鸿生。前排孙女珣珣、巴金。



■ 1926年的巴金

1926年下半年，巴金住在上海康悌路（今建国东路）康益里4号的亭子间，在那里，他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《面包与盐》。

人的疮,也挖自己的疮。”他批判自己人云亦云;批判自己挖空心思编写“思想汇报”;责备自己参与批判胡风集团;责备自己在斗争冯雪峰、丁玲、艾青时,“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头”;责备自己遵照上头旨意写文章批判柯灵的《不夜城》……

他忏悔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,从文艺整风、反胡风,到反右、大跃进、学大寨……所写的许多虚假的表态文章,谴责自己在许多优秀知识分子被迫害至死时自己没有站出来说话。丰子恺受批判时,他不曾替他“讲过一句公道话”,他感到内疚;翻译家张满涛无辜打成反革命,他怕“引火烧身”,“一声不响”,他感到内疚……

巴金内心的榜样是卢梭、伏尔泰、左拉等为真理、正义勇于抗争、不畏强暴的先贤。这些人格导师秉承的是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的传统。苏格拉底把自己定位为“身体庞大而且日趋懒惰”之城邦的“牛虻”,使命只在刺激与叮咬。苏氏临死前说:“富有正义感的人如果打算生存下去,哪怕是让生命延续很短的时间,就必须过一种平民的生活而不从政。”

巴金对胡风的忏悔绝无敷衍:在迫害胡风的运动中“我究竟做过一些什么事情”?自己服从上级指示,屈从政治压力,“在



■ 温馨的一家

1962年摄于巴金的书房。这家庭的气氛是那样的温馨,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满意的微笑。

■ 巴金与在法国的留学生合影

巴金与中国留学生詹剑峰(右)、桂丹华(中)合影,摄于1928年春天,是巴金创作《灭亡》的时候。





■ 《寒夜》剧照

巴金的很多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搬上了银幕,《寒夜》就是其中优秀的一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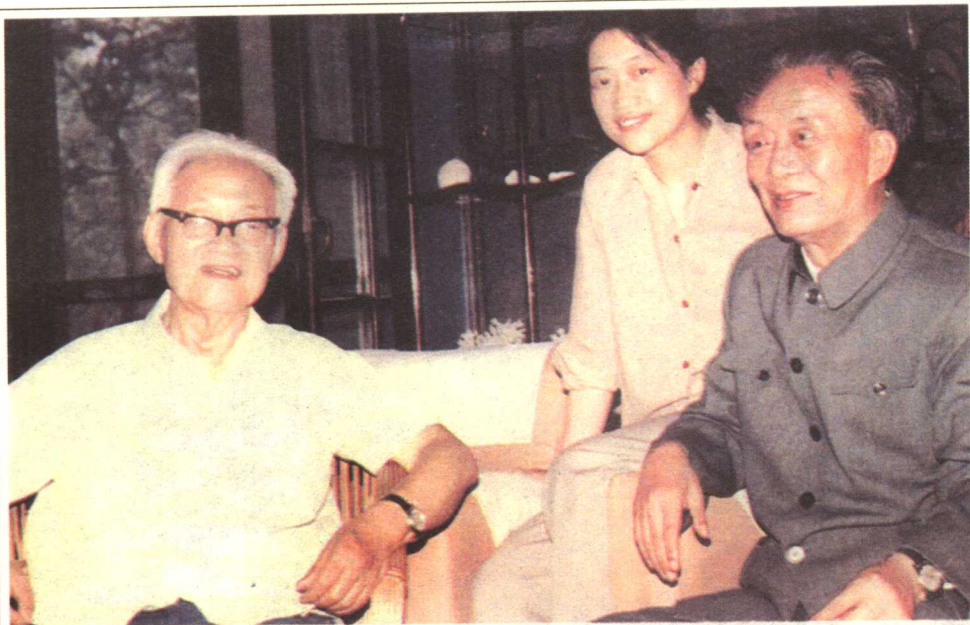
■ 巴金与《家》摄制组人员合影

后排右为导演陈西禾,前排右是主要演员孙道临,左为张瑞芳(饰瑞珏)。

■ 与香港读者在一起

巴金曾多次说“自己是读者养活的”,一再强调创作要“说真话”、“把心交给读者”。





■ 1978年艾青在上海探望巴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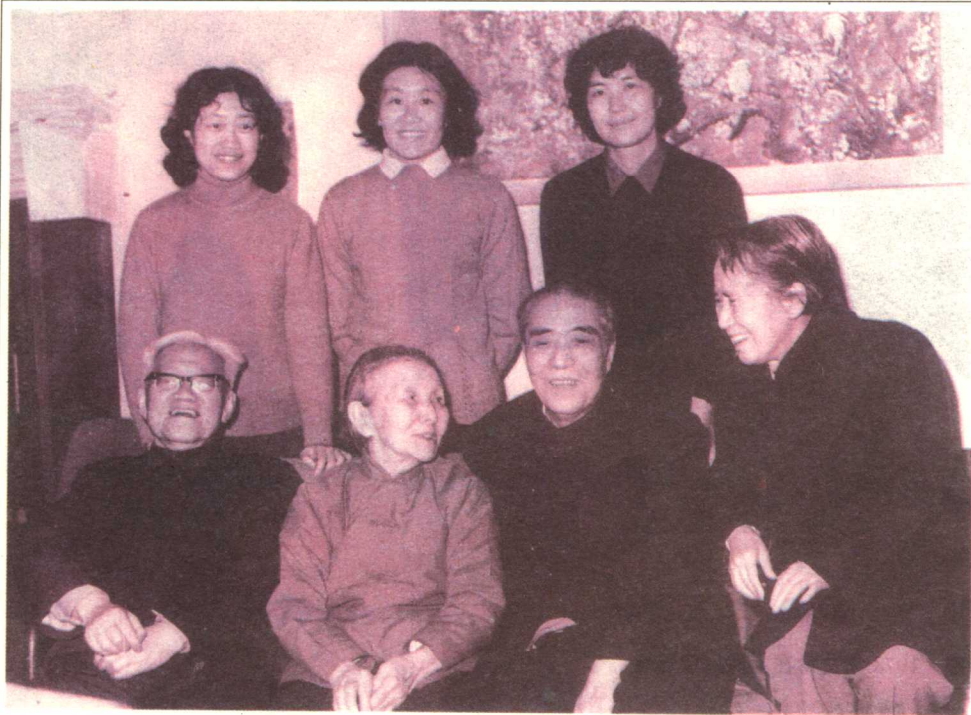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写过三篇文章(批判胡风和路翎),主持过几次批判会”。在郑重向路翎道歉时巴金说:“虽然不见有人承认对什么错误‘应当负责’,但是我向着井口投掷石块就没有自己的一份责任?”“50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。可是想到那些‘斗争’,那些‘运动’,我对自己的表演(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),也感到寒心,感到羞耻。今天翻看30年前写的那些话,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,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。”

“文革”培养了一批“永远正确”的人,巴金说:“在他们,讲话不过是一种装饰,一种游戏,一种消遣,或者是一种手段。总之不论讲话听话,都只是为了一时的需要,所以他们常常今天讲一套话,明天又讲一套话,变化无穷,简直叫人没法跟上。他们永远正确。”

巴金把《随想录》视为一部“刚刚开始”的著作,“现在我看清楚了这样一条路,我要走下去,不回头。”这路就是托尔斯泰式的“说真话”的路,就是“良心”的路,就是“言行一致”的路。

他知道这条路走起来,是“荆棘丛生”。

在《怀念胡风》中巴金说:“我想讲真话,也想听别人讲真话,可是拿起笔或者张开口,或者侧耳倾听,才知道说真话多么不容易。”他因此能体会托尔斯泰晚年的痛苦,在《“再认识托尔斯泰”》中他说:“托尔斯泰所追求的就是言行的一致。在他,要达到这个目标是多么困难,为了它,他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”



■ 几代人的友谊

“即使我的生命很快化为尘土，我那颗火热的心仍然在朋友们中间燃烧。我们的友谊绝不会有结束的时候。”巴金谈到友情时这样说。

二、曾经的遭遇

1966年初夏，巴金作为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忙于会务，7月初在杭州送走外宾回到上海，就被作家协会指令参加“运动”，继而关进“牛棚”，被抄家，被批斗，开始过着“牛鬼蛇神”的日子。1968年夏“四人帮”举行全市电视批斗大会，批斗巴金，使其受尽人格侮辱。之后被送到松江奉贤等地农村，从事重体力劳动。

1972年巴金夫人不堪忍受折磨，在屈辱中患病致死。1973年7月，“四人帮”控制的上海市委对巴金宣布处理决定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，不戴反革命帽子，发给生活费（即让其从自己被冻结的存款中每月提取一部分补贴家用）。不久，允许其从事翻译工作。1975年9月，组织关系转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英文组。

1974年起，一直坚持翻译赫尔岑之回忆录《往事与随想》，借以宣泄自己对“文革”的控诉。直到1976年，才恢复做人 与 写作权。“文革”后第一篇文章载于1977年5月25日《文汇报》，名曰《一封信》。

《随想录》之《十年一梦》回顾自己说：“从我1967年起我的精神面貌完全不同了。我把